

祝贺陈其泰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

#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编委会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

祝贺陈其泰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编委会 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 /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  
编委会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68-6963-8

I. ①文… II. ①文…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4923号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编委会 编

---

责任编辑 张 文

特邀编辑 张 越 张爱芳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张希广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51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963-8

定 价 98.00 元

---



陈其泰先生



白寿彝先生与学生陈其泰合影（1985年）



中秋节师生合影（2002年）



祝贺陈其泰先生七十华诞合影（2008年）



博士论文答辩合影

左起：赵海旺博士、张越教授、瞿林东教授、陈其泰教授、刘小萌研究员、彭卫研究员、田园博士（2011年）



在学术研讨会上师生合影（2015年）



师生欢度教师节（2016年）

# 前 言

从 1979 年第一篇文章《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史学史资料》（即后来的《史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至今，陈其泰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已达 300 余篇；从 1992 年第一本专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陈其泰先生已经出版专著 20 余种（含合著、主编，其中个人独著 13 种）。尽管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的数量中，至少实实在在地反映了陈其泰先生在其学术研究道路上勤奋耕耘、努力探索的扎实印记。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陈其泰先生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期间，曾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1962 年底，适逢首次统一招考研究生，陈先生遂报考了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使刘节先生受到批判，跟随刘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愿望也未能实现。陈先生曾经说：“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1978 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陈先生再次报考，终于有机会随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真正走上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道路。

陈其泰先生继承了刘节先生和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特点，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风格：具体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相结合、古代史学研究与现代史学研究相结合、史学史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相

结合。

在史学史研究领域，最为基础的研究工作是对史家和史著的研究。在陈先生的著述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董仲舒、司马迁、班固、何休、李焘、马骥、万斯同、全祖望、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崔述、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廖平、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蒙文通、傅斯年、王献唐、郑振铎、刘节、萧一山、尹达、白寿彝、刘大年、饶宗颐、金应熙、齐世荣等古今史家及学者，陈先生都有专文或专著研究；《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史通》《续资治通鉴长编》《日知录》《宋元学案》《文史通义》《汉学师承记》《圣武记》《日本国志》《清代通史》《中国通史简编》《金明馆丛稿》《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主编）等史著，陈先生亦有专文或专著探讨。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对先秦时期史学、秦汉时期史学、宋代史学、明清之际史学、清代史学等古代史学诸阶段的发展，对晚清史学、民国史学为主的近代史学的发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时期史学、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均有系统研究和独到见解，形成了在扎实、厚重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构成的贯通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特色。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密不可分，陈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一直关注不同时代史学发展中的史学理论成就，他梳理了《史记》《汉书》等重要史著中反映出的史学理论特点，专门探讨了刘知幾、章学诚等史家的史学理论体系，深入研究了民国时期重要史家的史学理论建树，全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陈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中始终关注学术前沿，强化问题意识，积极捕捉新的学术增长点，他率先提出或深入研究的史学与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公羊学、中国历史编纂学、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研究视角，都体现出了他在学术研究中

的继承与创新精神。2018年初夏，汇集了陈其泰先生主要研究成果的《陈其泰史学萃编》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9卷，约300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陈其泰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四十年来在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陈其泰先生1993年开始招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7年开始招收该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博士、硕士和访问学者近30人。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我们当年报考研究生和入学后的学习，都是以“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为研究方向，经陈先生的悉心指导而完成了学业，走上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岗位。2018年适逢陈先生80寿诞，在这样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日子里，我们同样也想对老师说：师恩难忘。我们每人选取了一篇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以“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为题编成本书，既表示我们曾先后受到老师的指导、感铭师恩且师出同门，也希望能以此书向老师汇报我们在老师培育下所取得的一点研究成绩，更愿意将此书作为一份礼物在老师80华诞之际赠送给老师，祝陈老师身体健康、学术青春永驻。

《文化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学》编委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

#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1

浅论历史事实（晁天义）/1

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宋学勤）/21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张剑平）/37

刘知幾的史科学理论成就（赵海旺）/56

五代时期：历史编纂优良传统经受的考验（张 峰）/68

论宋代史家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宋馥香）/86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

——以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赵永春）/108

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术关联（赵 旸）/130

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析论（李廷勇）/142

王鸣盛论史的卓识

——以六朝政治、军事地理为中心的考察（施建雄）/150

论赵翼评价历史人物（白兴华）/166

魏源的历史编撰思想与实践（刘兰肖）/180

《光绪会典》纂修新探（舒习龙）/193

“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

——基于比较视野下的考察（刘永祥）/220

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叶建）/239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沈颂金）/253

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张越）/270

法律史学史视域下的陈寅恪隋唐刑律制度研究（张雷）/285

20 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

——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田园）/300

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张爱芳）/313

1950 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屈宁）/326

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

——以“军机处的设立”为例（王秀青）/347

史学探索的魅力

——陈其泰教授访谈录（屈宁）/358

陈其泰先生的学术探索和创新之路（张峰）/401

关注重大理论问题 探索史学演进脉络

——陈其泰先生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刘永祥）/416

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路径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述评（王志刚）/433

附 录：陈其泰教授著作目录 /441

# 浅论历史事实

晁天义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

什么是历史事实？为什么要讨论历史事实？如何正确理解历史事实？在漫长的中西方史学发展史上，这些以“历史事实”为核心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这种情况直至19世纪以来才得到改变，随着历史学科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就史学研究的哲学前提进行思考和审查。在谈到哲学对史学进步的推动作用时，英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形象地比喻说：“十九世纪对于西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个称心如意的时代，它洋溢着信心和乐观主义。……这是天真无邪的时代，历史学家在伊甸园里走着，不用哲学来遮蔽身体，在历史这位上帝的面前，一丝不挂，也没有感到害羞。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罪恶，同时体验到了堕落。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妄想抛开历史哲学，就只不过像一些裸体主义者，徒然忸忸怩怩地，想在自己郊外的花园里重建一座伊甸园一样。今天，这个使人作难的问题是不能再回避的了。”<sup>①</sup>就这样，历史事实同史学理论的其他问题一样，也有待人们为它补发一张“合法证明书”。关于历史事实的讨论绝非无关紧要，因为它将决定历史学有没有资格迈入科学行列，分享“科学”的荣誉，或者永远被排斥于科学殿堂之外。

在此背景之下，近代以来先后有不少史学家和哲学家讨论过历

---

<sup>①</sup>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17页。

史事实，仅笔者目力所及的西方学者至少有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傅龄、卡尔、布莱德雷、李凯尔特、克罗齐、柯林武德，中国学者则有李大钊、张荫麟、杜维运、许冠三等人。众多名家的参与改变了长期以来历史事实乏人问津的状况，相关问题也被相继引申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澄清。尽管这样，关于历史事实的思考和解释非但没有因此而宣告结束，相反还暴露出更多的问题。波兰历史学家耶日·托波尔斯基曾抱怨研究者将大量工夫用于技术性方法的介绍，而对史实的确定重视不够，他说：“确定历史事实的问题在著名的历史方法教科书中是作为枝节问题处理的，尽管事实上确定事实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基本工作之一。传统上几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始资料考证上，因而，继介绍考证原则之后，紧接着就是描述材料处理（形成综合）的方法。有些注意到论述原始资料考证的章节中的确定事实的程序，确定事实在那儿被看作是原始资料‘解释’工作的结束，它通常包括所谓对原始材料的理解。”<sup>①</sup>我们相信托氏所说的情况在实践的历史学家那里更为严峻，试想真正有几人在动笔之前会反思史实的性质和来源呢？人们之所以看重技术性方法的介绍而轻视史实的审查，可能源于长期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即唯有方法论才是将史学研究推向进步的关键。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也应看到只有方法施于可靠的研究对象时，史学研究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史实与方法对于史学研究犹如车之二轮，缺一不可，以强调方法为由而轻视史实的做法显然失之偏颇。

“重视不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历史理论家们往往以发挥一家之言见长，而对史实的性质、来源等问题缺乏整体考察。因此我们从史学理论家们关于史实的评论中了解更多的是他

<sup>①</sup> 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48页。

们心目当中的史实，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总体性认识。总的看来，如何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一次总体性的探讨，无疑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

## 一、什么是历史事实？

### （一）两种误解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历史事实”进行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误解之一就是望文生义地将它视为人类既往活动的全体。实际上，史学理论层面的“历史事实”一词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它通常是指经由历史学家选择之后的研究对象。试图把人类过去的活动一古脑儿地装进“历史事实”的大口袋，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家的典型做法。在那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sup>①</sup>，总体史的理想几乎吸引了史家的全部注意力，似乎很少有人思考不加选择的“历史”怎样被研究者有效地消化和处理。正是对“史实”不加限制的追求，最终葬送客观主义史学的美好前景，兰克开创了史学道路，使后人在“史实”的重压下像蝾螈一样举步维艰。英国客观主义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如是描写乃师德林格尔对史实之求全责备：“他是不肯用不完全的材料进行写作的，而对他说来，材料总是不完全的。”这种无奈也发生在阿克顿本人身上，在他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剑桥近代史》第一卷的序言里，他就曾哀叹压在历史学家身上的要求，大有迫使他从一个饱学之士变成一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之势。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屈指难数，假如不加别择而力图统统纳入史事范围的话，可以想见研究者该承担多么巨大的压力！难怪卡尔曾讽刺说，除非刻意追求史实之完备详尽的做法有所改变，否则历史学家就只

---

<sup>①</sup> 卡尔语，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3页。

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得把历史当作一件坏事加以放弃，开始热衷于集邮或其他爱好古董的方式；要么就只好进疯人院去终其天年。”<sup>①</sup>

无独有偶，这种“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矛盾也曾引起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思考。面对大量茫昧不明的历史领域，史学研究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它们都理解为历史事实吗？或者历史学家只有对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克罗齐设问道：“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周围世界的历史，但和我们无限的求知欲比起来，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啊！”论者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结束这种精神上的烦恼的最好方法是我所采取过的办法，就是，把这种烦恼推进到极限，然后暂时设想：提出的问题和其他无限问题都已得到满足，像人们在无穷的正在发生中的问题中所能得到的满足一样，就是说，立即一个一个地答复它们，使精神踏上一条永远获得无数正确答案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道路。现在，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sup>②</sup>

我们并不赞成克罗齐对史实的理解方式，但他化解人类认识能力与研究对象之间矛盾的这种策略却值得借鉴。克罗齐以哲学家独有的敏锐眼光告诫人们，除非把史实理解为研究者从大量事件或史

<sup>①</sup>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0—11页。

<sup>②</sup>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页。

料中选择的结果，否则历史研究就无法有效展开。因为那样的话未等研究者开展工作，他就已经沉没到事实的大洋中去了。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出于对研究的可操作性或实际价值的考虑，历史事实都应被理解为历史素材中那些“有意义”的内容。卡尔警告说，有人常把“历史事实”理解为那些对于所有历史学家而言全是一样的基本事实，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其实“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sup>①</sup>。由此足见“素材”与“史实”不可混为一谈，客观主义历史学家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将历史素材与历史事实加以有效的区别。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误解是，人们往往以“史料自己会说话”为借口，反对选择史实。实际上，这种做法同样不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历史事实。史料是人们研究历史的媒介而非史实本身，然而不少考证学者通常将史料与史实混为一谈，甚至误史料为史实。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曾如是描述那种仅重视史料搜集而轻视史实择取的做法：

一切校讎考证家，皆习于搜集一切事实之有关于其专门特殊研究者，未尝自为抉择去取，遂视完全精确客观的事实之搜集，为首要之事。凡一切历史事实，其在历史中之位置，皆有平等之权利，若保留其颇为重要之若干，而屏弃其比较不重要之若干，是乃一种主观的选择作用，随个人之幻想而各相殊异者。凡历史之事，决不能牺牲任何一单独之事实。<sup>②</sup>

---

①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页。

② 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25—226页。